

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1-0181-07

按语:敦煌学一度号称“显学”,即“地位显赫的学问”。然时至今日,其地位仍未有实质性改变。概因懂得此门学问的人屈指可数,其中某些领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本该是个热门,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门研究者也就十数人,卓有建树者仅三五人而已。其中原因也许主客观纠葛复杂,但有一条显而易见:敦煌学不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之列,属于立体交叉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现实特点,即敦煌学家总在各地星罗棋布,除了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批艺术考古类专家,高校、社科院系统都未能将三位以上的敦煌学家有效编制到一个单位。鉴于此,多辟些敦煌学阵地,将散落的敦煌学家通过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的方式联结起来,就尤为必要且具备重要现实意义了。

目前,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科研阵地,主要有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台湾地区敦煌学会主办的《敦煌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唐研究》等。这些对于敦煌学的学术科研进展以致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周期长,倾向性强,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排版困难的考证性论文未能够及时刊发,书法史、写本笔法特征分析等方面的论文也较难发表。百花齐放,独缺一枝。鉴于此,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艺术百家编辑委员会决定开辟“敦煌学研究”栏目,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征先生敢于担当,勇担责任,不仅为该栏目的创办鼓与呼,且不辞辛劳,热情组稿,四处奔走,同时把《艺术百家》、更把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学术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气魄,“百家争鸣”的宽广胸襟推向了海外。栏目创设伊始,主要刊发与敦煌学相关之艺术、民俗、文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以促成敦煌学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共同繁荣之局面,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敦煌学自 1908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江浙学者罗振玉分别发表第一篇论文,至 2008 年底《艺术百家》创设“敦煌学研究”专栏,恰为 100 周年。时代意义,自不待言。当此之际,编辑部衷心感谢“江浙散人”黄征教授的大力支持、毫无推脱、热心主持,同时也与黄征教授一道恳请广大学人,为本栏目热诚撰稿,企盼支持,共同研讨,共襄盛举。

日本汉籍古写本俗字研究与敦煌 俗字研究的一致性^{*}

——以日本国宝《毛诗郑笺残卷》为中心

王晓平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的广大地区保存至今的汉籍写本,对于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敦煌写本研究延伸到东亚汉籍写本研究,建立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敦煌学的纵深发展。运用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分析日本国宝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残卷》中的俗字,可以证明日本古写本与六朝初唐俗字的一致性。打通敦煌写本与域外汉

^{*} 作者简介:王晓平(1947—),男,汉,四川开江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日本帝塚山大学人间文化学部客座教授,国际理解研究所教授,大学院人间文化研究科教授,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东亚比较文化会议中国分会会长,日本万叶古代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日本中国学文萃》、《人文日本新书》主编,《中国诗学》编委,《汉学研究》编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日本文学,诗经学,敦煌学,国际中国学。

由于残卷中没有题跋,不能由此辩明写本的传承、书写年代,吉川幸次郎说“寺传称菅公(平安时代杰出学者菅原道真)之笔,是否出自菅公之手另当别论,其为平安朝写本无疑。”明确断定其为平安时代。^③小川环树认为,根据以下事实,不难确定其所属系统。^④即其旁训中数处书写着“清”字,表明所注乃清原家读法,这正与清原家传本书“江”字表明所注

乃大江家读法是一样的。这让人想到其为大江家系统的本子;然而,其中又有一处旁注,书写着“江”字,表明所注为大江家读法,而若是大江家的本子,那就不会自注这个“江”字的,所以其为江家本的说法,就难以成立。清家本作为江家训点之处,还恰好与此本所载者相合,这说明此本恐怕是纪传道系统的本子。小川环树说“若允许稍微想像一下的话,其出于与大江家并驾齐驱的纪传道菅家,亦未必不可能。相传此本为菅原道真亲笔书写,恐怕亦事出有因。”^⑤

小川环树还注意到,大念佛寺本没有清家本上常见的“亻”(“传”字之“亻”旁,以指毛传之说)、“ㄣ”(“箋”字“竹”头之省,以指郑笺之说)这样的标记。也就是说,所有训读,均根据《毛传》,而没有根据《郑笺》做的训读,即便清家本表明《传》、《箋》不同读法之处,此本亦仅表一种训读。如《召南·羔羊》中的“退食自公”,三章反复“退食自公”,清家本每章皆加“亻”点和“ㄣ”点,即标注《传》、《箋》不同读法。《传》曰“公,公门也。”《箋》云“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其解不同,而大念佛寺本则只有一种训读,不似清家本两种皆注。对《传》、《箋》之异同,不予在意,即非全然不顾,亦是于训读时不予严格区分。

日本学者内野熊一郎曾撰《大念佛寺本钞写毛诗传私考》一文。^⑥根据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本子不是清原、大江家本,但仍是一家相传的一家说本,而且从文献上看日本平安时代初期这个系统的《毛诗》本,一定已在流通。

通过这样的对照,内野得出的结论是,大念佛寺本《毛传》残卷,恐怕是传存以《释文》一本系、特别是以六朝通俗本(《毛诗正义》所谓俗本)系统为原本的古老形态的一个本子,因而也可以认为是与《释文》正本、《毛诗正义》本等别一系统的传本,其中可以看到与《毛诗正义》本、《释文》正本不同的古老形态的字句,这些对于《诗》义解释也会有不小的贡献。至今日本学者有关大念佛寺本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在训点方面,如西崎亨发表了《关于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残卷的训点》,^⑦而对于其文字的研究尚不充分。

二、大念佛寺本俗字与敦煌俗字互通性

南北朝时期,文字书写紊乱的情况和发展经过,在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讲得很清楚。据他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尔后故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籍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产生这一时期的敦煌卷子本,变体、简写、俗字、错字相当可观,完全符合颜之推所说的情况,而大念佛寺本中的异体字、简体字、假借字、错别字,也不让敦煌《诗经》残卷。唐初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其从孙颜元孙编《干禄字书》、张参编《五经文字》、唐元度编《九经字样》,做的都是考定俗字、归于楷书的工作。这些书也都传入日本。随着中国正楷文字的确立,日本流通的汉字也接受了这一次统一文字的成果。

不过,日本汉字仍然保留了不少六朝初唐流传的俗字。至今日本公布的通用汉字中,还有不少是旧日的俗字,如“兎”、“稻”、“聰”、“懷”等,数目还不少。有些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不知道这一段文字交流史,反而以为那些字都是日本创造的汉字。失于此,存于彼,这类现象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绝不是个别的。

回过头来看大念佛寺本,里面有很多俗字。其中很多是与敦煌《诗经》残卷相同的。《干禄字书》选字 1599 个,分俗、通、正三体。这三体,按照该书序言的说法是“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尚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牋启、尺牘、判状,固免詆訶。(若须作文,言及选曹詮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⑧

这里就按照《干禄字书》的顺序,将敦煌《诗经》残卷和大念佛寺本共有的俗字举例于下。

1. “聰、聰、聰,上中通,下正,诸从忞者并同,他皆放此。”伯 2529《羔羊》:“素丝五總”,则当改为“總”大念佛寺本《羔羊》:“素丝五總”,同。伯 2529《兔爰》:“尚寐无聰”,当改“聰”。

2. “矜、於,上通下正。”伯斯 2516《鱼丽序》:“始矜忧勤,终於逸乐。”伯斯 2570《鱼丽序》:“始矜忧勤,终於逸乐。”大念佛寺本《大序》:“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3. “懷、懷,上通下正。”伯 2529《蟋蟀》:“懷昏姻也”。大念佛寺本《卷耳》:“维以不永懷”。

4. “標、標,上標記字,必遥反;下標梅字,频小反。”《標有梅》,念佛寺本“標”字作“標”。大念佛寺本多“木”、“扌”旁互换字。《南有樛木》“樛”字作“摎”。

5. “強、彊,尚通下正。”伯斯 2506《采芣》传“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2506《车攻》:“弓矢既调”《箋》:“调谓弓彊弱”。大念佛寺本《行露》《序》:“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6. “繩、繩,上通下正。”《熹平石经·抑》:“子孙繩繩”,当为“繩繩”。大念佛寺本《螽斯》:“宜爾子孙繩繩兮”。以上 1-6 例皆为平声。

7. “土、土,上通下正。”伯 2529《日月》:“照临下土”。大念佛寺本《樛木》:“南有樛木”《传》:“南,南土也。”大念佛寺本“土”旁皆作“土”。大念佛寺本《大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基”字“其”下作“土”。

8. “发、天,上通下正。”甘博 004—4《贤愚经》:“所生之处,命不中发”。大念佛寺本《桃夭》:“桃之夭夭”,“夭”字作“发”。

9. “體、體,上俗下正。”伯 2529《相鼠》:“相鼠有體”,“體”当为“體”。大念佛寺本《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传》:“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體”当改为“體”。

10. “禮、礼,并正,多行上字。”伯 2629《相鼠》:“人而无礼”,“礼”当改为“禮”。大念佛寺本《麟趾》《序》:“则天下无犯非礼”。

11. “採、采,上通下正。”大念佛寺本《关雎》:“左右採之”。《采芣》:“薄言采之”。

12. “愁、整,上俗下正。”伯 2506《六月》:“愁居隻获”。大念佛寺本《葛覃》:“服,愁也。”

13. “旧、臼,上俗下正,诸字从臼者并准此。”伯 2514《南陔序》:“非孔子之舊也”,“旧”下字作“旧”,不作“臼”。大念佛寺本《大序》:“足之蹈之”,“蹈”字右下作“旧”,不作“臼”。至今日本汉字中“臼”旁仍有作“旧”者,如“稻”不写作“稻”。以上 7—13 例皆为上声。

14. “廢、癈,上妨廢,下癈疾。”伯斯 2506《六月序》:“鹿鸣癈则和乐缺也。”大念佛寺本《大序》:“伤人伦之廢”“王道衰,礼义癈”。

15. “乱、亂,上俗下正。”伯斯 2514《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大念佛寺本《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

16. “皂、兒、貌,上俗中通下正。”伯斯 2514《采芣》《传》:“翼翼,壮健之皂也。”大念佛寺本《葛覃》:“维叶莫莫”。《传》:“莫莫,成就之皂也。”亦作“貌”。上文“兒”字旁注“貌,本”,即古本有作“貌”者。念佛寺本《传》:“赳赳,武貌也。”

17. “嘆、歎,上俗下正。”伯 2529《泉水》:“兹之永嘆”。大念佛寺本《大序》:“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18. “聽、聽,上通下正。”伯 2514《伐木》:“神之聽之”。大念佛寺本《行露》《传》:“召伯聽讼也。”以上 13—18 皆为去声。

19. “蒺、發,上俗下正。”伯 2514《吉日》:“蒺彼五豝”。大念佛寺本《大序》:“蒺言为诗”。

20. “飭、飾,上俗下正,或上通下正。”伯 2506《六月》:“戎车既飭”,当作飾。大念佛寺本《葛覃》:“薄澣我衣”。《传》:“妇人有副褱盛飭以朝事舅姑。”“飭”当为“饰”。

21. “稷、稷……,并上俗下正。”伯斯 2570,伯斯 2514《华黍序》:“时和岁丰,宜黍稷也。”大念佛寺本

《采蘋·箋》“盖黍稷云”。

22. “節、節……并上俗下正。”伯斯 2514《常棣》《传》:“朋友以义相切節節然”,“節”字写正字。大念佛寺本《殷其雷序》:“皆節儉正直”。

23. “革、革,上通下正。”《羔羊》:“羔羊之革”,大念佛寺本“革”字作“革”。伯 3742《二教论》:“略引张氏数条妄说,用惩革未闻。”其中“革”字作“革”。以上 19—23 皆为入声。

除这些见于《干禄字书》的字以外,在大念佛寺本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与敦煌写卷写法完全相同的俗字,它们可以作为敦煌俗字的旁证材料,也可以放在一起探讨俗字滋生传衍的规律。

1. 《关雎》:“寤寐思服”,“寤寐”,大念佛寺本作“寤寐”,甘博 078《维摩诘所说经》卷中“观众生品第七”:“如梦所见已寤”,“寤”字作“寤”。斯 2965《佛说生经》:“饮酒过多,皆共醉寐”“寐”字作“寐”。见《敦煌俗字典》。^⑨

2. 《关雎》:“优哉游哉”,大念佛寺本“悠”字作“悠”。“悠”为“悠”的增笔字,不见于《干禄字书》、《龙龕手镜》(高丽本),斯 298《太上灵宝洞玄度五练生尸经》:“其并悠远”,又“此之近事,非复悠远之传”,其中的“悠”字写法与此同。见《敦煌俗字典》。^⑩

3. 《卷耳》:“陟彼高冈”,大念佛寺本“冈”字作“𡵓”,为“𡵓”字的省笔字。斯 2524《语对》:“陟𡵓(冈):《诗》云:‘陟彼𡵓(冈)兮!瞻望兄兮!’”

4. 《蠡斯》:“蠡斯羽,薨薨兮”,大念佛寺本“蠡”字作“蠡”。斯 114《诗经?豳风?七月》:“五月斯蠡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蠡”字正作“蠡”。见《敦煌俗字典》,第 559 页。

5. 《行露》《序》:“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大念佛寺本“暴”字作“暴”,上作“田”不作“日”。《干禄字书》:“曝,暴,上通下正。”《龙龕手镜》日部:“暴(暴)、暴、曝,三俗;暴,正,备木、蒲报二反,日乾也。”“暴”为“暴”的增笔字。斯 10《诗经》:“终风且暴”,斯 318《洞渊神咒经·斩鬼品》:“子孙暴死”,其“暴”字上亦作“田”。见《敦煌俗字典》。^⑪

“陵”,大念佛寺本作“陵”。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写本中“陵”多写作“陵”或者“悳”,如《东大寺讽诵文稿》第 5 行“迦陵”说法,“陵”即为“陵”^⑫字。^⑬第 89 行“毕悳寺侧作舍”,“悳”字亦为“陵”。敦煌俗字多此写法,见《敦煌俗字典》。^⑭

6. 《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大念佛寺本作“蔽”。

7. 《采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箋》云:“言夫人于君祭祀而薦此豆也。”“薦”,大念佛寺本作“瘠”。《采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箋》云:“盖

母薦之,无祭事也。”“薦”大念佛寺本亦作“薦”。此本凡“薦”字皆写作“薦”、“薦”盖为“薦”字之讹变。“薦”为“薦”的通假字。上博简二《昔者君老》:“□之必敬,女(如)宾客之事也。君曰:‘薦(薦)豐(禮)□。’”^⑤

三、大念佛寺本俗字研究为敦煌俗字研究提供参照补充

在大念佛寺本中,也有一些不见于《干禄字书》、《龙龕手镜》(高丽本)的写法。这里有些是属于讹变,有些是增笔俗字。例如,其中的“州”字都写作“翯”。《关雎》中“在河之洲”的“洲”,写作“翯”,《卷耳》:“维以不永伤”《箋》中的“旅酬”的“酬”,作“翯”。“豕”旁则增笔作“豕”。《兔置》:“啄之丁丁”之“啄”,大念佛寺本作“啄”,《行露》:“何以速我狱”,《箋》云“不以角,乃以啄”一句,大念佛寺本作“不以角,乃以啄”。《龙龕手镜》(高丽本)口部:“啄,许卫反,口啄也。”“啄”,今作“啄”。

下略举数例,以供与敦煌俗字比较研究参考。

1. 《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大念佛寺本“兕”作“𧈧”。《干禄字书》:“𧈧,兕,兕,上俗中通下正。”“𧈧”或为俗字“𧈧”的误写。又,《龙龕手镜》杂部:“𧈧,俗;𧈧,古;兕,正,徐死反,《山海经》:似牛,苍黑色。郭璞云,一角,重千斤也。今作兕。《说文》云:象形字。”

2. 《樛木》序“后妃逮下也。”“逮”字大念佛寺本作“逮”,“逮”字或为“逮”字的俗字“逮”的讹变。《龙龕手镜》辵部:“逮、逮、逮,三俗;逮,正,徒爱反,及也,兴也,行及前也;又徒帝反。”敦煌写本中多作“逮”。

3. 《桃夭》:“灼灼其华”,“灼”字大念佛寺本作“灼”,为“灼”字的讹变。

4. 《兔置》:“啄之丁丁”,大念佛寺本“啄”字作“啄”。《龙龕手镜》扌部:“啄,音卓,击也,推也;又俗音啄。”

5. 《兔置》:“赳赳武夫”,“赳”字大念佛寺本作“赳”。《龙龕手镜》(高丽本)走部:“赳,音紮,式也。”

6. 《汝坟》:“王室如燬”,“燬”,大念佛寺本作“燬”,为“燬”的增笔字。

7. 《采芣》:“采”作“菜”。“菜”为“采”的增笔字。

8. 《采芣》:“被之祁祁”。祁,大念佛寺本左作禾。为“示”旁与“禾”旁相乱。

9. 《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传》:“雷出地奋,震惊百里”。大念佛寺本“奋”字作“奮”。《干禄字书》:“奮、奮,上通下正。”《龙龕手镜》大部:

“奮、奮、奮,三俗,奮,正;方问反。进也,动也,振也,起也。又武兒也,又鸟呼欲飞先奮也。”“奮”或为“奮”字之讹变。“奮”又为“奋”的俗字“奮”的增笔字。《干禄字书》:“奮,奮,上俗下正。”《龙龕手镜》大部:“奮,俗;奮、奮,二正,徒活反,失也。”

10. 《采芣》《传》:“采芣,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任焉。”大念佛寺本作“采故马 = 舄 = 车前草也”。“采”有作“采”者。“采”为“采”字的讹变。

11. 《麟之趾》《序》“趾”有作“止”者,右旁注“趾”,而诗中“麟之趾,振振公子”则作“趾”。

大念佛寺本有些明显属于讹字,却无校正标记。正如内野熊一郎所说,很多都是原本如此,书写者格外看重自己原有的底本,而没有根据《毛诗正义》改正过来。太田次男也十分强调日本写本对底本的忠实。他说“当时,日本人尽量忠实地保持唐钞本原状的心理作用很强,但有意识地改变本文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这一点固然可以从很多钞本德文字得到证实,然而在我们对其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却不能不考虑到这些钞本在形成过程中的域外因素。比如,日本书写者对于自己所持原本的偏爱会使很多明显的讹误得不到及时纠正,周围精通汉文的学者毕竟人数有限,切磋琢磨的机会较少,以及本民族思维习惯对书写产生某种干扰,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增加文字讹误的几率。然而,辨明哪些讹误又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仍然不能不从与敦煌写本等形近时代的资料的对比中入手,以便逐步深入到探讨传播中的演变的层面中去。

大念佛寺本中的下面字的俗化、类化和相混相乱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碑文和敦煌写本中都很常见。

1. 《大序》:“皆谓譬喻,不斥言也。”“斥”,大念佛寺本作“斥”,为增笔俗字。斯 2536《春秋谷梁经传》:“斥言桓公以恶莊也。”其中“斥”字作“斥”。“斥”乃“斥”之增笔。“斥”也增笔写作“斥”。《大序》:“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传》:“先王,斥大王、王季。”大念佛寺本“斥”字作“斥”。

2. 《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箋》云:“言后妃将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菹”,大念佛寺本作“菹”。“辗转反侧”,“辗”,大念佛寺本作“轆”。

3.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大念佛寺本“顷”误作“顷”。又作“倾”。斯 789《毛诗诂训传》:“倾有梅,倾筐盛之。”“顷”亦作“倾”。^⑥“我马虺隤”,大念佛寺本“虺”写作“虺”,“虫”、“由”形近而讹。

4. 《樛木》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也。”两“逮”字,大念佛寺本皆作“逮”。

5. 《葛覃》:“为絺为绤”,大念佛寺本“绤”误作



“络”形近而讹;《葛覃》:“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大念佛寺本“薄”误作“溥”。“是刈是穫”,“穫”字大念佛寺本作“淮”

6.《蠹斯》,大念佛寺本“蠹”写作“蚤”,“蚤”为“蚊”字的俗字。《龙龕手镜》虫部“蚤,俗;蠹、蠹,二正;蚊,今音文,蠹蟹之属也。”“蠹斯羽”,“蠹”又作“衆”,旁注“蠹本”,而不予改正。

7.《桃夭》序“国无鰥民”,大念佛寺本“鰥”写作“鰥”,“魚”、“角”形近而讹。

8.《甘棠》,“棠”有作“堂”者。

9.《汉广》:“不可休息”,“休”作“然”。乃在“休”之别字“然”之上再乱一点。“休”之作“然”,见北魏《贾思伯碑》、《司马晒墓志》。“休”乃会意字,指人在树下,字下赘加横画,起指事作用,“一”又改写为“灬”。“言秣其驹”,“驹”作“駟”。

10.《深蘋》之“蘋”,有作“蘋”者。同篇“维筐及筥”,“筥”作“筥”,为竹、艹相混之例。

11.《羔羊》序“皆节俭正直”,“皆”作“皆”,《大序》:“皆谓譬喻,不斥言也。”“皆”亦作“皆”。

12.《摽有梅》:“摽有梅,顷筐暨之。”“暨”,大念佛寺本作“𡗗”,盖“概”字的左右位移俗字,而《传》文中又作“暨”。写本中这种情况颇多,反映了辗转传抄中的文字混乱。

这些大体是照抄底本,或者是在抄写时无意识写错。这说明,大念佛寺庙本并没有照《毛诗正义》刊本作细致的校勘。

以上所举,不过是大念佛寺本俗字的很少一部分,就此也可以看出,它们既可以与我国国内所保存的《诗经》异文相比较^①,也可以与敦煌等地保存的俗字相对照^②,以搞清楚俗字的流布情况,特别是作为围绕文字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更有必要深入探讨。近年来我国关于中古俗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古代字书如《龙龕手镜》(高丽本)等尽管可以说收字可观,但对当时的俗字也不可能网罗无遗,域外保存的汉籍写本将使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使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充实。

四、结语

21年前,日本学者太田次男撰文正确指出“唐代以及唐之前,曾有过以钞本为中心的时代,当时钞本的数量当然是现存钞本所不能相比的,想用现存的极少部分残存资料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本文的正确性,无疑是极其困难的。”明确这一点,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本身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研究唐代前后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也十分重要,因为那个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从文本来讲,也是赖写本才得以实现的。中日文学、文字交流的许多现象,都不能置其中的写本因素而不顾。然而,我们却远远没有将写本

传达给今人的信息全部解读出来。因而,太田次男对中国学界对日本汉籍旧钞本的冷漠颇为不满,曾批评说“从总体看,由于宋以后中国学者一直是靠刻本作学问的,所以,惟有刻本才可以信赖,这种认识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③其实,写本的不稳定性和非权威性,也是许多学者轻视它的一个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术交流不够,许多写本比刻本更难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加强对域外写本的介绍和研究,扩大对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逐步积累这方面的成果,就会使“东亚写本学”形成牢固的基础。

中国学者对域外汉籍写本的关注由来已久。明治初年发现的古抄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中保存了许多南北朝时代的古字和武周新字,这不仅令当时的日本学者惊叹,而且也引起了有幸见到的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何如璋、张斯桂皆为之撰写题跋,其中一位名曰金祁的学者的三次题字,对其学术价值的评介尤为中肯。他说“此书与玄应《众经音义》,近世极重之,以其不仅解释经,而中所引多古书之亡佚,并世传刻本之误谬,皆可以资博览考证。”^④他深惜其沉霾释藏,读者无人,而多闻者不知,即便自己只能借留于几案数日的机会,时时展玩,也感到深爱精彩艳发,奇古无前。在他第三次撰写的题跋中更专门谈到这一写本对于考辨六朝古字的意义:

北朝造别体字一千有余,皆破汉魏以来之法,而增捐移易为之,亦滥觞于汉分书也。当时盛行,故碑板之传于今者,皆一同,至隋而衰,至唐而尽,以太宗好右军书故也。故唐写经无北朝别体,而日本则沿旧式,源流可考见云。^⑤

当年杨守敬、罗振玉等人都曾热衷于介绍包括写本在内的日藏汉籍。从那时起,对这些写本的研究也不绝如缕。特别是在整理相关文献时,近年来由不少学者相当自觉地利用域外写本资料。今后的工作,可以从编写域外写本汉籍目录、影印和出版相关写本、开展释读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入手,趁那些写本尚存、未被损毁之际,抢救过来,为汉文化的学术发展尽力。

打开一扇窗,又见一片天。读罗振玉、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当年撰写的写本影印题跋,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写本的热情是相互感染的。《古逸丛书》等的编辑出版从客观上说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也是一种激励。

21世纪不论是从研究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来说,还是从国家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会远远超过过去的世纪,很有可能让敦煌写本和域外汉籍写本研究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楚小庆)



- ① [日] 太田次男(著), 雫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2 期,第 80—91 页。译文中所谓“旧钞本”,实指“古钞本”,日语中“古字有‘旧’”与“古”两义。另,译文中将“狩谷掖斋”误作“狩谷掖齐”,盖日文中“斋”、“齐”形近,且时有相乱故也。
- ② [日]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藏版《毛诗二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抄本,第十集,1942 年版。
- ③ 吉川幸次郎《毛诗正义校定资料解说》,《东方学报》,京都,第 13 册第 2 分册。《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0 卷,筑摩书房,1986 年版,第 459 页。
- ④ [日] 小川环树《清原宣贤の毛詩抄について》,《小川环树著作集》第 5 卷,筑摩书房,1997 年版,第 43—44 页。
- ⑤ [日] 小川环树《清原宣贤の毛詩抄について》,《小川环树著作集》第 5 卷,筑摩书房,1997 年版,第 44 页。
- ⑥ [日] 内野熊一郎《大念佛寺本抄写毛詩傳私考》,《汉文学会会报》,东京教育大学,16,1955 年版,第 1—11 页。
- ⑦ [日] 西崎亨《大念佛寺藏〈毛詩二南〉残卷の训点について》,《训点资料的基础的研究》,思文阁出版,1999 年版。
- ⑧ [唐] 颜元孙《干禄字书》,收入《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一期别卷,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5 年版。
- ⑨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分别见第 434 页,第 270 页。

- ⑩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09 页。
- ⑪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 页。
- ⑫ 陆明君《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9 页。
- ⑬ [日] 中田祝夫(解说)《东大寺讽诵文稿》,东京勉诚社,1966 年版,第 5 页。
- ⑭ 黄征《敦煌俗字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49 页。
- ⑮ 白于蓝(编著)《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22 页。
- ⑯ 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79 页。
- ⑰ 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9—236 页。
- ⑱ 黄征《敦煌俗字种类考辨》,《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7—43 页。
- ⑲ [日] 太田次男(著), 雫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2 期,第 80 页。
- ⑳ [日] 小林芳规(解题)《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汲古书院,1978 年版,第 153 页。
- ㉑ [日] 小林芳规(解题)《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汲古书院,1978 年版,第 154—155 页。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Vernacular – Character Studie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Japan and in Dunhuang: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Maoshizhengjian Remains as Its Center

WANG Xiao – 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books now kept in the Chinese – character – zone such as Japan and Korean Peninsula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The extension of Dunhuang script study to East Asian Chinese script stud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r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y. Applying the results of Dunhuang vernacular – character – study to analyze the vernacular characters in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Maoshizhengjian Remains can prov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ernacular characters in ancient Japanese scripts an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integrate Dunhuang script study and foreign Chinese script study an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Adashinonenbutuji version of Maoshizhengjian; Dunhuang vernacular character; script; Dunhuang study; East Asian script study

(上接第 194 页)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Hanjiangwanglingbian

GAO Guo – fan^{1 2}

(1. Center of Asian Culture Study, San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2)

(2.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Hanjiangwanglingbian is a classic among Dunhuang vernacular culture study. Its characterization is vivid and impressive.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e four characters of LIU Bang, WANG Ling, WANG Ling's mother and XIANG Yu, as interprets the result of Chu's ending and Han's rising caused by LIU Bang and XIANG Yu's actions.

Key Words: LIU Bang; WANG Ling; WANG Ling's mother; XIANG Yu; Dunhuang study; Hanjiangwanglingbian